

藏事·汉文文献丛书
西藏社会科学院整理

西康图经

任乃强 著

西藏古籍出版社

西康图经

任乃强 著

西藏社会科学院整理

西藏古籍出版社

2000年2月出版

藏新登字(02)号

藏事·汉文文献丛书

主编:次旺俊美

《西康图经》

任乃强 著

出版 西藏古籍出版社
发行

地址:拉萨市色拉路 21 号
邮编:850000

印刷:冶金部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2.75

字数:568 千字

插页:

版次:200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2500 册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7—80589—027—7/K·18

总 序

我国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浩繁的历史典籍。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与各民族一道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一些活动已经用藏、汉、蒙、满等多种文字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来，这些珍贵的记录，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汉文记载藏族先民活动的历史，远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当时的汉文古籍中已有藏民族形成之前 150 余部落“散处河、湟、江、岷间”，且僻远处有“发羌”、“唐牂”等记录；到了唐代，藏族先民活动及各民族相互交往的重大事件在汉文文献里已较为集中；进入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反映藏事的历史记载在汉文文献中已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据估计，专门记载藏事历史活动的汉文文献已达千余部，加之散见于浩如烟海的中华历史典籍中的零星记录，有关藏事历史的汉文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积极挖掘和整理藏事汉文文献同挖掘整理藏文文献一样，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或者是对历史文化继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原则问题。长期以来，境内外分裂主力势力在政治渗透的同时，念念不忘向历史文化领域里渗透，他们或露骨地抹杀各个民族历史文化联系，否认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竭尽所能向我区青少年、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渗透被歪曲了的西藏历史；或以博古通今的学者面目出现，大谈所谓其历史文化研究成果，肆意攻击和歪曲历史上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联系，歪曲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此欺骗国内外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而一些外国的所谓藏学研究者，也常常以藏学权威自居，把境外零星的资料和道听途说的牙慧拼凑在一起，发表了许多敌视中国人民或有损于中国主权的“高论”。对于这些历史文化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坐视，除旗帜鲜明地予以斗争外，还须以积极的态度挖掘整理记载藏事历史的汉文文献，用客观而详实的史料驳斥分裂主义分子散布的种种谎言。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早在1981年，西藏社科院汉文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着手对藏事汉文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先后整理出版了《新旧唐书·藏族史料》、《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清代藏事奏牍》、《西藏史大纲》、《钦定廓尔喀纪略》、《平定金川方略》、《进军西藏日记》等一大批记载藏事历史的汉文文献。

挖掘、整理藏事汉文文献，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全凭着广大科研工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分寒暑，伏案鉴别，字斟句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以惊人的速度整理汉文文献百余种，出版图书数万册，为藏学研究工作，为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驳斥分裂主义散布的种种谎言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及为整理、出版藏事汉文文献作出突出贡献的陈家璉同志，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带领一批老学者和中青年藏学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不计名利，甘于奉献，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汉文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直至心力不支，住进医院，这种不计得失的敬业精神值得后继者学习和效仿。

藏事汉文文献挖掘整理工作开展以来，受到了西藏自治区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西藏社科院历届党委始终将这项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1998年7月，院党委根据汉文文献整理出版进展情况和陈家璉同志的身体状况，将设在北京的汉文文献编辑部移至拉萨，之后，院党委经多次研究，决定将该项工作继续下去，并在原基础上加强力量，陆续整理散见于历代典籍中的藏事汉文文献，直至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

藏事汉文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已历经十几年的时间，

其间刊印书类较多，曾先后有《西藏研究丛刊》、《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等多种名称，其版本各异，有16开影印竖排本，有线装本，还有大32开影印本、重排本及少量简字横排本，且大部分已版的古籍影印图书未及断句、标注，因而仅能供少数学者阅览或检索之用。另外，在时间跨度上，前段整理工作主要侧重于清代以前的古籍文献资料，较少涉及清代之后至西藏民主改革期间的资料。有鉴于此，我们的后续工作将对以前的书类名称、排印方式、整理幅度及时间跨度作出适当调整：1. 为了与所整理的文献内容相吻合，做到书类名称表述准确，将原几种书类名称统一更改为《藏事·汉文文献丛书》。2. 统一汉文文献图书版本，除因特殊需要出版少量16开精装本和线装书外，一律改为国际统一标准的大32开本。3. 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今后出版藏事汉文文献图书一律加注、标点、讹误校正并附上内容说明，介绍历史背景，版式改用常用简体字横排，力求使《藏事·汉文文献丛书》的阅读对象扩展到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4. 在时间跨度上，我们将着重点移至民国和民主改革以前时期，对于清代以前的汉文文献，在原整理出版的基础上亦可择要选编。

挖掘、整理、出版藏事汉文文献是一项政治原则性兼学术性很强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须以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工作，

整 理 说 明

《西康图经》是我国近代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代表作，在国内外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原书分为《西康图经·境域篇》、《西康图经·民俗篇》和《西康图经·地文篇》三册，分别出版于1933年10月、1934年10月和1935年7月。由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印行。此书系作者根据其1929年入康考察一年所得材料，综以有关文献、档案资料而写成。自1931年起陆续在《新亚细亚月刊》上连载，而后略作修订成书单行。作者原拟将全书分为境域、地记、交通、产业、民族、宗教、土酋、吏治、外患、史鉴、关于康藏之图书等11篇。后因故仅撰成境域、民俗、地文三篇。其中民俗篇为产业、民族、宗教、土酋等篇的合并，地文篇为地记、交通等篇的合并。而外患、史鉴等篇拟撰的内容则纳入作者后来所著的《康藏史地大纲》之中。关于康藏之图书，作者后来曾撰有《西康地图谱》等文。

《西康图经·境域篇》主要针对当时康、藏界务纠纷及国内对西康有无建省的条件和必要的争论，阐明康藏境域的界分及其历史变迁和西康建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

《藏事·汉文文献丛书》总序

在《丛书》的选题上，力求择题精当，内容健康，形式多样，并具有可信、可备、可用的历史资料价值，使《丛书》更好地发挥辨理明史，格物正言，斥谎驳谬的作用。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开展正常、健康的藏学研究尽一份力量。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藏事·汉文文献丛书》编辑部

1999年8月

途径。故此书一出版，即引起国内强烈反响，不仅学术界予以广泛的好评，而且在政治上受到高度的重视，时任新亚细亚学会会长的戴传贤特为作序，赞誉此书为“边地最良之新志”。此书出版后两年，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正式成立，书中论点成为建省的主要依据。作者也因此而被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由此，可见此书的影响。

《西康图经·民俗篇》因以首次最详尽地论述了西康的民俗文化而著名。由于作者不仅亲身以一年时间步行深入西康各县作过细心的实地考察，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有其藏族夫人之助，得以消除文化阻隔，深入民族文化的心理层面，故能摒弃偏见，对藏族文化作了比较客观、真实的描述。这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错误的将藏族文化概括为宗教文化，忽视或不甚了解藏族文化中的非宗教文化，因而此书所记述的西康民俗文化，特别具有历史价值。不但在当时对匡正视听，纠驳民族歧视偏见产生过较大影响，即在今日仍为十分宝贵的民俗资料。

《西康图经·地文篇》则为首次运用现代地学知识，科学的论述康藏高原地质、地理、气象、水文的著作。作者以深厚的地理功底和实地考察研究，第一次系统地对西康的山脉、河流走向、支分和古今中外异名作了考证，纠驳了诸多谬说，澄清了不少讹传，并对汉藏地名的翻译规范进行了尝试。有很强的学术性。虽然随着近年对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深入，此书的一些论述已显得

西康图经

略为粗疏，不尽确切；但在七十年前，人们对康藏高原地文还十分陌生之时，此书的论述堪称空前精详，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其中一些考证至今仍被辗转征引。

《西康图经》出版已过半个多世纪，原书今已罕见。随着我国藏学研究的发展，需求此书的人愈来愈多。1985年，西藏社科院将此书列入《藏事·汉文文献丛书》整理出版规划之中，主持其事的陈家璉同志为出版此书作了大量的工作，除请任乃强先生亲自对原书校阅一过外，还为此书出版奔走呼吁。年逾90的任乃强先生认真地对全书进行校阅，除订正印刷讹误外，还对个别地方文字作了增删，对有些地方加了批注。1999年，根据陈家璉同志建议，西藏社科院决定拨出专款，将此书与任乃强先生所撰《康藏史地大纲》、《西康诡异录》等一并整理出版。由院长次旺俊美、副院长车明怀及院信息处负责主持组织这一工作，并约请任乃强先生之子四川社科院研究员任新建与罗润苍研究员、陈文渊副编审等承担此书的整理编辑工作。经过近半年的共同努力，完成对全书的整理工作，由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

《西康图经》内容广博、篇幅宏大、体例复杂，生僻字与典故、人物、地名众多，使用文字有汉、藏、英、法等文；原书为竖排繁体字本，标点符号与现今常用规则不同，引文甚多，且不少是引自档案材料和现今已难见到的书籍，加之印刷讹错较多，整理工作相当繁重。为此，在车明怀同志的主持下，整理编辑成员曾多

《西康图经》整理说明

次集体研究，反复斟酌，做了大量的校勘正讹工作，以求既忠于原著又使现今读者便于阅读。

此次整理以任乃强先生自校本为底本，参考了作者残存的手稿和所征引的书籍、文献、档案，厘订文字，改为简体字横排，重新标点，统一人名、地名及译名，并根据作者批注对原书个别错讹、不确切地方进行了订正。将原书三册合为一，以利读者保存和查阅。为便于读者阅读，整理者对书中一些人物、事件、地望、生僻典故等加了简要的注释。为便于区别，原书的文内注以方括号表示；整理者所添加之注，文内夹注者以圆括号表示，其余以页下注形式刊出。由于时代的局限，原书使用了一些含有民族歧视、侮辱性的民族称谓，为保留历史原貌，整理中未予改正，仅以注释说明。全书整理工作的分工为：罗润苍负责〈境域篇〉、任新建负责〈民俗篇〉、陈文渊负责〈地文篇〉。车明怀对全书作了审定，罗润苍对书中藏文作了订正和转写，任新建对全书注释作统一、补充。陈文渊对全书版式作了设计。原书附图附有作者手绘地图 40 余幅及照片 40 余张，颇有历史价值。此次整理中剔除了 10 余幅模糊不清的图片，其余仍附入书内。

作者小传

任乃强，字筱庄，四川南充县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任乃强先生 1894 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5 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今北京农业大学）。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后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1920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旋返川，协助张澜先生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28 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

1929 年，首次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十一县。餐风宿露，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致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自记》）。获得大量资料，相继撰成《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

为冲破民族隔阂和语言障碍，在这次考察中，与藏族女子罗哲情错结婚。在她的帮助下，自 1932 年起陆续撰成《西康图经》〈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此书发表后在图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的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作者小传

1933年应张澜先生之邀，赴广西等地考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南方民族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返川后相继任重庆大学教授、省三中校长等职。

1936年西康建省后，被推荐为建省委员，再次入康。继续完成了对西康各县之考察。1940年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为撰修第一部《西康省通志》殚精竭虑，广集博征，作了大量工作，撰有《西康通志纲要》一卷。这一时期，他遍阅康区旧档和珍藏之藏文秘籍，广泛采集康藏民族资料，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撰成《康藏史地大纲》，校注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等书，并发表《吐蕃丛考》等教十篇论文和《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发掘出王晖棺、樊敏碑等重要文物。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任先生在地学方面亦有很深造诣。潜心致志于康藏地图之测绘研究工作，历时十五年，终以自己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不仅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并在解放西藏时被作为进军用图之蓝本。

1943年受华西大学之聘，任教授兼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次年，随华大考察团第三次赴康北考察，着重对寺庙和土司进行了研究。返川后，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对元以来康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喇嘛教之发展，作了深刻剖析，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1946年，任乃强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为推动国内的藏学研究，他联合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起组织了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团结藏、

西康图经

汉学者，节衣缩食，支持刊物的出版，一直坚持到 1949 年 9 月，共出刊 29 期。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的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共同联合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对后来藏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 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言献策，他的不少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为解决进军西藏缺乏地图问题，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与了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此后，由于“左”的错误，令他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即使在被错划为“右派”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仍未间断研究工作，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多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方面亦从康藏地区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1960 年撰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鸿篇巨著，系统地考证和阐述了大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经济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驳斥了前人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的冤案得到改正，年已耄耋的他，振奋异常，以超人的精力，自 1979 年以来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民族史》、《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并以多年考察心得，写成《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奉献国家，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为开发康藏资源作出了贡献。

任老年逾九十，仍思维敏锐，笔耕不辍，亲为研究生授课，为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不遗余力。1989 年 3 月因病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总 序

我国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浩繁的历史典籍。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与各民族一道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一些活动已经用藏、汉、蒙、满等多种文字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来，这些珍贵的记录，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汉文记载藏族先民活动的历史，远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当时的汉文古籍中已有藏民族形成之前 150 余部落“散处河、湟、江、岷间”，且僻远处有“发羌”、“唐牦”等记录；到了唐代，藏族先民活动及各民族相互交往的重大事件在汉文文献里已较为集中；进入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反映藏事的历史记载在汉文文献中已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据估计，专门记载藏事历史活动的汉文文献已达千余部，加之散见于浩如烟海的中华历史典籍中的零星记录，有关藏事历史的汉文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积极挖掘和整理藏事汉文文献同挖掘整理藏文文献一样，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或者是对历史文化继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原则问题。长期以来，境内外分裂主力势力在政治渗透的同时，念念不忘向历史文化领域里渗透，他们或露骨地抹杀各个民族历史文化联系，否认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竭尽所能向我区青少年、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渗透被歪曲了的西藏历史；或以博古通今的学者面目出现，大谈所谓其历史文化研究成果，肆意攻击和歪曲历史上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联系，歪曲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此欺骗国内外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而一些外国的所谓藏学研究者，也常常以藏学权威自居，把境外零星的资料和道听途说的牙慧拼凑在一起，发表了许多敌视中国人民或有损于中国主权的“高论”。对于这些历史文化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坐视，除旗帜鲜明地予以斗争外，还须以积极的态度挖掘整理记载藏事历史的汉文文献，用客观而详实的史料驳斥分裂主义分子散布的种种谎言。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早在1981年，西藏社科院汉文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着手对藏事汉文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先后整理出版了《新旧唐书·藏族史料》、《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清代藏事奏牍》、《西藏史大纲》、《钦定廓尔喀纪略》、《平定金川方略》、《进军西藏日记》等一大批记载藏事历史的汉文文献。